

陈惠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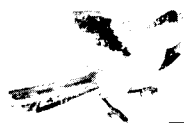
想象上海的 N种方法

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惠芬 · 著



想象上海的 N种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象上海的 N 种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上海”与
城市文化身份建构/陈惠芬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550-0

I. 想... II. 陈...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861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张 翼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想象上海的 N 种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陈惠芬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78 1/16 印张 16.5 插页 3 字数 201,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6550-0/I·326

定价 28.00 元

序 一

方 克 强

自从萨义德将西方的“东方学”界定为“想象的东方”之后，似乎任何人文学科或学问都可以加上“想象”的前缀，以示与本质主义的客观性相区别。这是因为，这些人文学科要处理的研究对象太巨大了，而且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塞着内在的异质性；另一方面，研究者又难以避免主观性与局限性，甚至出现主体与对象的自我缠绕。于是，想象的成分在所难免，客观本质不可把握。“上海”，作为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都市空间与历史实体，同样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上海就是想象上海，尤其是需要对“上海”作出整体性与同质性的理论概括之时。

然而，文学与标榜客观性知识的学术不同，它是公然申明自己的想象性与虚构性的。当文学与上海交织成“文学上海”时，它事实上表现了不同作者对“上海同一性”的不同认知和认同。这些作者“想象上海”的方式以及“想象中的上海”的作品成果，将难以企及的“上海性”转化为人们所熟悉的感性实体，将不可界定的“上海城市文化身份”凝结为可把握的描述模式。因此，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的文化想象，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价值，而且富含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上海体验和认知，而且投射着社会群体心理的脉动与变迁；不仅认知着历史的和现

实的上海,而且还影响和开创着上海可塑性的未来。

因此,本书在论题的选择与研究理路的设计方面是新颖而独到的。它是“上海学”研究与上海文化、上海文学创作研究的有机结合,在两者富有现代感的张力中,提出了“文学上海”这一独特的视角与簇新的概念。“文学上海”作为研究与阐释对象的创意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想象的空间,同时又是整体性的文化象征符号,既具有文学分析内在的凝聚力,又是活力四射、内蕴丰富多元的意义生产之源。而且,当“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在论题上组合成相关性后,它又将论题的价值层面拓展向意识形态批评内涵与城市文化特征重构的现实性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沿性、开拓性的创新论题。

从研究方法来说,本书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互补。文化研究方法向文学的挪移以及文学研究向文化领域的拓展,是当下学术界的世界性潮流。但文化与文学如何在研究对象以及分析方法等层面上有机融合,这几年一直是理论探索的课题和实践努力的方向。本书在这方面的孜孜以求与具体操作是成功的。作者注重文学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将文学批评的固有方法与文学专业的训练技能发挥到最大程度,同时,作者又圆熟地掌握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分析手段,致力于发掘文学文本内在的深层的文化心理蕴涵,揭示出作家身份与其想象上海方式的勾联,以及投射其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价值。这是对文学文本进行文化研究的成功范例。

本书的框架结构与分析模式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内在的合理性。上篇“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建构起20世纪90年代文学想象上海的四种代表性模式,既是对文学现象的有力概括与文学经验的恰当总结,也是概念清晰、理论性强的逻辑分类。下篇“认同的吊诡和复杂”,是对上篇的深入思考和合理的逻辑演进,由想

象上海的方法归纳分析追寻到想象主体即作家本人的身份分析，由“文学上海”的题材聚焦推进到“城市文化身份”的内涵阐释。其逻辑思路清晰地循着从文本到作家、从文本表层到文本深层、从侧重文学到侧重文化这一路数深化。

本书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与建构意识也是值得称道的。研究“文学上海”并非简单描述现象或者满足于理性归类，而是为了发现问题、思考症结并着眼未来。只有这样，聚焦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上海”的学术研究才能“透视”出当下的现实意义和新世纪的前瞻性。本书作者在阐述其研究宗旨时说：“我认为，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城市认同问题，可以为城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拓展出新的途径；而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也将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找到新的契机。”这表明，作为文学研究者，作者具有以“专业”推动文学进程和文化建设的强烈参与感和责任心。正因为如此，作者提出的对“老上海”的“迷思”阻隔了人们的想象力的批评，“真正具有现实敏感的书写难以见到”的“瓶颈”，以及“时尚化”的症候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和可能性”的当下思考等等，都是富有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建设性的见解。

“文学上海”是个开放的概念，具有阔大的思想容量、观念张力和阐释弹性。希望本书的出版，开其研究的新路，并延伸出 N 双脚印，从而无愧于“上海”这个只能凭藉想象力才可把握的巨型象征符号。

2006 年 4 月 3 日

序 二

吴 俊

1984年夏,我从复旦毕业,考上了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钱谷融先生。入师门未久,钱先生就给我们介绍前几届的同门学长。印象中先生曾几次带着惋惜的口气提到:前两届学生里有个陈惠芬,很有才华,就是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影响到许多事。后来直接见面时,果然如先生所说,这位陈师姐脸带病容,看去身体确实相当弱。等到我们互相间熟了,有时我就戏称她作“病西施”。现在忘了当时她听了是否生气过。

学校里的交往并不多,主要是她因病已不住校。但在她毕业以后,我们的联络就频繁起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上海有家文学评论刊物非常著名,就是《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之说就掲載于此。我的一些文章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陈惠芬是这家刊物的编辑,那时编发过我的不少稿子。大概也就在这个时期,她的研究和写作主要转向了女性文学,属于全国几个有影响的女性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我视之为“女权者”,亲切之余,敬畏有加。在她跟前说到性别问题,再不敢造次。有几次言语稍不留神,竟遭痛贬。这种时候,她的身体好像格外强壮起来了。我虽遭贬,却也为她高兴。这些情形,说起来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旧事了,或者竟是上个世纪的故事了。现在,连我也多少有些“世

纪老人”的模样了。

9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交往不多。那时我出国了一阵,回来后又大多不住上海。但后来我知道,陈师姐的兴趣也随时势而变,她对我们生活的城市——上海开始有了想法。那时“上海热”正方兴未艾。师姐算是老上海了,而且,学术出身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加上她因病弱而变得格外敏锐、敏感的神经和感受能力,研究上海,对她应是得天独厚的理想选项。记得有几次听她在电话中谈及她的上海研究,很有点受到启蒙和刺激的感觉。我也是祖居的老上海,但我的“上海感觉”却很迟钝,没有看出身边周围的生活竟有如此的新鲜,而作为文化学术的话题,上海的空间还有如此之大。这次读到师姐的书稿,她命名为《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从书名上看,我的切身感受倒是与它颇有点形似。

具体来谈读过这部书稿的体会,大致有三点很值得一说。一是在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上,本书从文学角度探讨城市身份认同的问题,可为城市文化研究拓展新的路径;同时,由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也将为文学的可能性找到新的契机。其次,本书表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探讨的自觉意识。90年代的上海已成历史,作者探究历史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当下上海及其文化现实的强烈关注。经由“文学上海”及所包含的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内涵的分析,本书提出并尝试解释了为什么有关当下上海的文学或文化书写“缺席”的问题及原因。这对上海(文化)研究显然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其三,作者表现出将文化理论、文学分析与上海的城市历史、城市现实有机结合的学术把握能力,使得相应的研究不仅获得了具体的落实,而且也极富理论深度,有助于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新的学术高度。概括地说,本书通过一系列“文学上海”的文化表现,探讨了有关上海的城市文化身份建构问题,使其在近年来的上海(文学、文化)研究格局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且突出的位置。关键问题的提出和具体(方法)的研

究,我以为是这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近年来,我看到的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忙乱日增。事务缠人闹得专业分心。陈师姐却借了病弱的真实又堂皇的理由,得以安顿在个人的兴趣里,这令人有些羡慕了。我现在天天锻炼身体,却又为了什么呢?但也不敢生病。真是奇怪的、矫情的两难。

2006年5月1日

目 录

序一	方克强	1
序二	吴 俊	1

导论: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1
-------------------------------------	---

上篇:想象上海的 N 种方法

一、纪实与虚构:想象上海的方法之一	31
二、日常和传奇:想象上海的方法之二	46
三、N 城记/自我与他(她)者:想象上海的方法之三	68
四、“离去”和“归来”:想象上海的方法之四	91

下篇:阶层/差异:认同的吊诡和复杂

五、“外来”身份和“精英”叙事	111
六、“老上海后裔”的历史建构	144
七、“新人类”的上海书写与认同	167

2 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

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八、“城市地图”、《上海遭遇》：个人记忆和集体想象	192
附录 “到底是上海人”与上海认同	219
参考文献	238
有关上海描写作品要目	240
后记	247

导论：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上海” 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文学上海’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季候性的灵魂鹜趋的热土。”^①上世纪亦即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未来上海的城市记忆中，想必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代，在这一时段里，沉寂了半世纪后的上海不仅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再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而且孜孜以求着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换言之，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在经济更为发达年代的后人眼里，这一时期的上海令他们惊叹的或许不是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诸多急切的关于自我身份的诉求。依有关研究所见，上海自开埠以来，其文化的状态即是多元混杂的，有关上海城市的形象也历来众说纷纭，但在 1949 年以前，并没有形成主动自觉的身份认同，而自 1992 年以来，上海则发展起了一种自动自觉的身份认同的努力。^②上海的身份建构在上世纪的 90 年代，尤其是它的初中期之所以成了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历史”地来看，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现代都市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积累不足、“底蕴”浮浅；而且在于，其时的上海，正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转型时期。“空

① 见《文学评论》2003 年第 2 期编后记。

② 杜维明：《“上海价值论”大扫上海文化不自信》，《社会科学报》，2004 年 2 月 9 日。

前”在于,长期的封闭造成了城市在物质和“气质”上的匮乏,都市的经验和氛围几近于湮没;“绝后”乃是,从“大上海沉没”到重新进行结构性调整,虽然向“国际化大都市”攀升的目标已定,“正是在追求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的普遍认同下,国家为上海的未来地位规划了‘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其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以及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在‘国际大都市’这一有关上海城市最新定位的流行话语中得到了凝炼概括”,“这一恢复了主体位置的自信,把以往话语中的暧昧、异己和梦想都变得透明,变得伸手可摸”^①——其间的“缺口”与引发的“震荡”不可谓不大。“兴奋”的同时,迷茫和焦灼也不请自来:正在为之努力和付出代价的未来将是怎样和能是怎怎样的?上海这张昔日的旧船票还能否赶上时代的新航班?都乃是未知的“后事”。认同的问题因此凸现了出来。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认同”就是解决“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是对自我“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②的清晰的主观意识,是必需的自我心理统一的能力。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是怎样实现或寻求这种“统一”的呢?

文学在其中显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以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大都并未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的方式构建出来。^③哈贝马斯也曾对英国文学参与公共事务的历史作

① 孙逊:《上海城市话语的文化解读》,《文汇报》,2003年11月30日。

② 爱理克逊(Erik H. Erikson):《认同——青年与危机》序言,引自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叟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9年版。

出过评论,他认为,18世纪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文学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如今被认作了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时,全社会正“忙于全面的构建——从民族国家……到文学市场和商品文化,到交通要道和现代主体”。^①某种意义而言,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重建的“镜像”或“掠影”,伴随着城市转型和经济的起飞,文坛和市场出现了多部以上海为描写对象并引起广泛反响的作品:

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上海作家俞天白以浦东开发开放为背景的《大上海漂浮》;

1995年,王安忆发表了以一个昔日的上海小姐一生的遭际为主线的《长恨歌》。作品初刊于《钟山》杂志(1995年第2、3、4期连载),同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96年12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以小女人散文著称的素素的《前世今生》。这部以老上海青楼女子、女学生、女明星和名媛名太们的时尚生活为描述对象的随笔之作,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累计发行量达到了68700册;

1998年6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女作家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首印1万册,不到十天即告售罄;

1998年9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人类”作家卫慧的“半自传体小说”《上海宝贝》,引起“轩然大波”^②;

1999年9月,乘着《上海的风花雪月》的热销,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陈丹燕的另一本关于上海的作品《上海的金枝玉叶》,首印5万册;

^① 转引自黄梅《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9日。

^② 据2006年3月5日google的搜索,仍有约5360000项符合《上海宝贝》的查询结果。

2000年9月,在《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分别销售到12万册、10万册之时,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陈丹燕的又一部上海故事《上海的红颜遗事》;

2001年,上海女作家程乃珊以“老上海后裔”的身份在《上海文学》上开设“上海词典”专栏;

翌年6月,“上海词典”的一些前期文字以《上海探戈》为名,由上海学林出版社结集出版,此后连续几月在有关的销售排行榜上居高不下;

2003年1月,程乃珊的又一部关于上海的作品《上海LADY》作为“文汇原创丛书”的一种出版;

2004年9月,上海作家、电影导演彭小莲编导的《美丽上海》获得了第24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上海文学》随即在同年的第11期上发表了该影片的文学剧本。

.....

加上上世纪80年代末已然问世的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①——或者“撇除”在外,它明显地还是属于上一时代的产物——那么我们不难肯定,上述作品已然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写作潮流,或者说可以称作90年代“文学上海”的文化现象,表现了写作者们参与建构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内在冲动。而所谓90年代“文学上海”,在本书中,乃是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关作品^②发表以来至新世纪到来后近十年间有关上海的文学创作,其中虽不乏市场操作的痕迹,却和社会心理的层面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即便是市场化的操作,社会心理的需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只有结合了社会大众的心理需要,市场化的操作才有成功的可能,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上海”正是在这

① 《大上海沉没》,俞天白著,1998年连载于《当代》(第5、6期)后,曾引起广泛反响,京沪两地曾发表多篇评论和召开研讨会,人民文学1991年8月出版单行本。

② 相当程度可以《长恨歌》的发表为标志。

样的结合点上发展起来并愈演愈烈的。

“认同”(identity)又称“身份”或“同一性”,本书的上篇“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讨论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对城市“共同文化”/上海“同一性”的追求和几种想象的方式。上海是一座有着悠久而复杂历史的城市,自它形成的一刻起,似乎便注定了其身份的混杂和“暧昧”。上海的历史上曾有很多离散社群,“正因为上海有移民,有外籍人士,日本人或者无籍的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印度人、德国人等很多外侨的居住……它才是一个混合体,是各种不同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族群之间的互动”,^①上海城市的身份因而不能依据“纯粹度”来确认,而需要多元性的体认。“历史性的分隔,对祖国的想象/记忆,居留国的疏离,返乡的渴望,以及对祖国的支持……”^②凡此种种,虽是后殖民理论对全球化时代里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离散族群的描述,和上海1949年前的历史却也不无相类之处:“战争、饥荒……革命和社会分裂贯穿了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而上海始终把自己设定为这个中国内部的‘他者’”,“它多多少少是被天朝政府丢给外国鬼子的”,“似乎只是偶然地在地理上属于这个国家”^③。1949年后,上海从“冒险家的乐园”一夜间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转身”变为共和国的长子,却不意间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变得狭隘萎缩。以至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重新实行改革开放之时,国人说起上海人来,已是一片“唏嘘”,同时不无“异类”的感觉:“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

① 杜维明:《“上海价值论”大扫上海文化不自信》,《社会科学报》,2004年,2月9日。

② Safran, W. “Diaspora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 1. Spring 1991. 转引自林秀玲《现代文学的女性身影·从哪里来 VS. 身在何处》,里仁书局。

③ 张旭东:《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中国学术》第3辑。

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①而上海一地的人亦不知或难以诉说自己和生活着的城市究竟是怎样的，“听凭外乡人评论上海，也觉得不对，却不知不对在哪里”。“在当时的‘寻根’热潮的鼓动下，我雄心勃勃地、也企图要寻找上海的根”，然而因为“当这城市初具雏形的时候，已到了近代，它没有一点‘古意’”，“因为短暂，还不及留下遗迹，即便有遗迹，也即刻淹没在新的建设之中。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它的考古层在推土机下碾得粉碎。我只有阅读资料”，而“坐在这一堆书面前，我却不知该从何入手。打开每一本书，都觉得不是我要的东西，而我要的东西，则又变得迷茫起来”。^②多年以后，王安忆曾这样描述她当年对上海的“寻找”。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或许正是上海这种长久以来的“失落”和“暧昧”，使得90年代以来的上海描写充满了对城市“共同文化”/“上海同一性”的巨大渴望。《长恨歌》、《前世今生》、《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探戈》，仅从书名已不难体会到其中的“抱负”，无论是洋洋几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还是“书被催成墨未浓”^③的“小女人散文”，都试图给出一个有着某种历史的“独特性”或“整体感”的“上海”。

犹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吸引了不少注意的《大上海沉没》中，“沉没”乃是一个关键的词语，据作者自己所记，其时京沪学界为此进行了多场座谈讨论，一些报刊作了广泛的报导，^④表达了人们对衰落中的上海的深深“痛悼”，而在它的续篇、90年代初中

① 余秋雨：《上海人》，《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② 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3页。

③ 素素对《前世今生》的自述。

④ 见《大上海沉没》作者后记。